

2022 年中国欧洲学会年会“欧洲转型与中欧关系”研讨会综述

齐天骄 钟 超

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烈气氛中,中国欧洲学会年会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上午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齐聚一堂,以“欧洲转型与中欧关系”为题,探讨百年变局下的欧洲转型与中欧关系发展。

会上,专家学者对大变局下的欧洲面临的困境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行了研讨,对欧洲转型、欧洲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形势做出研判,并就如何促进中欧关系、推动双边交流提出了若干建议。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开幕式及大会发言

在开幕式致辞环节,中国欧洲学会荣誉会长周弘研究员首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继而就欧洲式现代化即“欧洲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她指出,面对 21 世纪以来接连不断的外部冲击,欧洲进入战略摇摆期;同时,欧洲也

在坚守其基本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并坚持创新,即欧洲模式的转型。但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一转型面临掣肘,而俄乌冲突也突出反映了欧盟协调的困境。鉴于此,欧盟开始向两个方向变化:一是向地缘政治回归;二是收紧贸易和投资政策,并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安全化方向转变。俄乌冲突更是打乱了欧洲的转型,欧洲已被美国多方面绑架,其对俄罗斯的制裁产生巨大的反噬效应。我们需要理解欧洲的处境,了解美国重返欧洲和俄乌冲突后中欧互信的降低、新冠疫情对中欧相互了解和理解鸿沟的加深和加宽作用,从而找到对欧政策的关键抓手,有针对性地加强中欧双方的合作。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研究员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他指出,当前世界局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难以预料的历史性变化。欧洲的安全秩序发生了三十年未有之变局,这意味着欧美关系发生了变化、北约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及欧洲和俄罗斯的全面对抗。欧洲的能源危机将刺激社会、政治、思潮等一系列变化。法德轴心能否正常运转、新成立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将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变化,中东欧在欧盟中的新角色及其影响是什么等,都值

得深入研究。欧洲之变也引起了中欧关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欧洲学会肩负重任。

山东大学校长助理、青岛校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邢占军在致辞中对年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对山东大学的悠久历史、人才培养以及对欧交流与研究现状做了重点介绍。

在大会发言环节,徐明棋研究员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主要经济体实力的消长是最重要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美间差距的缩小相伴随的,是欧洲整体实力的明显下降。虽然俄乌冲突给欧盟带来了新的地缘政治冲击和经济代价,但从更长远的发展视角看,欧盟的经济竞争力下滑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与欧盟的基本制度有关,也与欧盟东扩和随之而来的协调成本不断增加有关。因此,欧洲要想维持全球影响力,必须更多依赖欧洲一体化机制。中欧经贸关系依旧具有合作共赢的特性。当然,欧盟对华经贸的利益诉求并不能完全消除欧洲社会各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新格局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加剧背景下对华认知上的偏见。

崔洪建研究员在发言中强调,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影响,使得欧洲转型正从“后里斯本时期”进入“后俄乌冲突时期”。将欧洲转型的不同时期与中欧关系变化的时间线相对照,可以发现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从地缘经济共生体系内的相互融合,向地缘政治竞争体系下的相互排斥方向转变。上述变化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中欧关系中,体现为非合作博弈正取代合作博弈逻辑。实现合作共处仍是中欧关系可取之道,但双方

急需解决好“志同道不合”的问题,尤其要克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惯性思维。

丁纯教授指出,欧盟的战略自主始于防务、外交层面,并逐渐扩展到经济、贸易和技术等领域,其核心是要解决战略萎缩并摆脱依赖。基于此,他从贸易视角出发,通过计算近十年来欧盟经贸严重依赖的主要经济体美、中、俄的相关贸易份额、贸易依赖显著性和依赖对称性,发现美中是欧盟最主要的经贸依赖对象,但欧美的依赖显著性强于欧中。欧盟所倡导的“开放性战略自主”落脚于“开放”和“自主”并行,其实质是一边保持“开放”以延续全球资源的可及性,推进自身的优先技术议程以增强能力;另一边减少对外单向技术依赖,保护自身市场,努力在摆脱经贸依赖和开放之间寻找平衡点。

吴志成教授认为,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赤字,世界进入变乱交织的新动荡变革期。第一,冲突扩大了欧洲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全球和平与安全赤字加深,暴露和凸显了当前世界特别是亚欧大陆的安全脆弱性;第二,冲突使北约沦为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严重威胁全球安全格局;第三,冲突使全球发展赤字凸显,经济、粮食、能源、社会危机叠加,世界正遭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考验;第四,冲突加深了全球信任赤字,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态势趋于恶化;第五,冲突加重了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治理和欧洲治理进程复杂艰难。

邓翔教授指出,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政策的规范性力量。俄乌冲突加快了欧盟的绿色转型,欧盟拓展了《欧洲绿色新政》内容,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然而,法德分歧、中东欧国家气候治理意愿较低、资金支持有限、技术水平掣肘,以及不同产业、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政策支

持和认知程度的差异,使得欧洲绿色转型存在不确定性。他认为,未来欧洲的绿色转型需要经济刺激与市场设计方案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强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二 俄乌冲突及其外部影响

俄乌冲突是塑造国际格局的“大事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欧洲是俄乌冲突最直接的冲击对象。年会围绕俄乌冲突对欧洲与大国关系的影响,对欧洲秩序、欧洲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阐发观点和交流思想,不仅涉及秩序理念、制度构建等议题,还涉及安全、经济、能源和政治等领域。

参会学者分析了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欧俄关系、欧洲与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全球经贸格局。田德文研究员指出,欧俄极度缺乏战略互信,欧洲既不相信“欧洲的俄罗斯”,又担心出现“俄罗斯的欧洲”;欧洲则担心“美国化”、惧怕“俄国化”。此外,美国不能接受欧俄走近,因此极力消除法德对俄缓和的可能性,进一步恶化了欧俄关系。关于欧俄关系的安全距离,他认为在双方再回到明斯克协议已不可能且这场冲突不会有真正的赢家的事实下,将取决于双方承受利益损失的能力。李舒莹副研究员全面梳理了欧美同盟关系的基本架构和趋势变化,对比了美国采取脱钩战略和欧盟采取战略自主战略的理论渊源、战略意图、政策手段和未来走向。她认为美欧在技术与产业、贸易与投资及战略安全领域呈现竞合关系态势,为此,欧盟在中美之间进行搭便车和追随强者的战略选择。张颢副教授总结了英国脱欧后的英欧安全合作的官方观点和学者观点。从官方来看,英欧没有在

安全防务领域同欧盟签署条约,但是强调对涉及共同利益议题采取全球性合作;从学者来看,英欧安全合作有北约、“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及英法强化合作三种模式。他认为,俄乌冲突是观察脱欧后的英欧安全合作的一个测试案例,从制裁、援助、军事部署三方面看,英国都没有和欧盟建立起特殊伙伴关系,反而高度依赖于北约和美国,且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何晴倩老师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俄乌冲突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她认为,中东欧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俄罗斯的整体敏感性与脆弱性依赖最强。短期内,西欧、北欧和南欧国家都将因俄乌冲突而面临重新组建供应链和开拓出口市场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重回稳定价值链所需的代价相对较小。而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行业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最强。

参会学者还重点关注俄乌冲突对欧洲整体战略和秩序架构的影响。闫瑾副教授阐述了俄乌冲突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战略自主的首要目标发生根本性变化,欧盟更加强调保护成员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在以大国竞争为特征的全球政治环境中维护欧洲利益;二是战略自主的意愿进一步凝聚,优先事项聚焦于安全与防务的自主能力建设;三是安全防务能力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德国安全与防务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为欧盟安全与防务自主建设注入新动力;五是欧盟战略依赖同步上升,欧洲战略自主面临两难困境。李济时教授认为,欧洲政治共同体是对于泛欧洲组织体系框架的一次重大重构,而且是以欧洲自主的方式进行的,必将对欧盟和

欧洲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他指出,欧洲政治共同体建立的动因包括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迫切需要政治团结和政治协调;乌克兰等国申请入盟,欧盟东扩压力增大,引起以土耳其为代表的长期等待入盟国的不满;英国脱欧后,英国与欧盟之间迫切需要一个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欧洲政治共同体建立的影响则是使俄罗斯更加孤立、使欧盟扩大进程更为平稳,以及有利于欧洲的战略自主。赵俊杰研究员指出,欧洲安全秩序是不对称、不均衡的安全架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处于主导地位,欧洲处于盲从地位。同时,欧洲安全秩序是基于冷战思维的架构,北约把俄罗斯视作敌人。欧洲安全秩序失控乱象表面看是由于俄乌冲突,但历史经纬较为复杂,美国操控北约把欧洲绑在对抗俄罗斯的战车上,欧洲战略自主形同虚设,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分歧公开化。未来欧洲安全秩序的构建,需要欧盟与俄罗斯增信释疑,推动俄乌平等对话;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慎重考虑制裁措施,避免陷入零和博弈;欧洲要加快防务力量建设,遵守赫尔辛基原则,避免出现军备竞赛。董一凡副研究员认为,俄乌冲突对欧盟能源转型带来极大冲击,欧盟对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能源安全供应的自主权被摆在突出位置,能源转型的优先次序有所下降。不可否认的是,欧盟也将能源危机视为能源转型的契机。欧盟在能源安全政策上选择了内外措施共同保障的道路,对外注重发展能源伙伴关系,促进进口多元化;对内通过内部市场建设、提升能源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式,达到提升能源自给和能源供应安全水平的目的。

参会学者也关注俄乌冲突对欧洲重点国家

和区域的影响。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中东欧地区向来是地缘政治的敏感区。独立后的乌克兰成为欧亚大陆的敏感地带,既是欧洲的战略枢纽,也决定欧洲大陆的繁荣和安全。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仅使中东欧国家更加重视地缘政治威胁,提高军事能力建设,还使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声音得到加强,导致欧洲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此外,俄乌冲突还加速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使得西巴尔干国家成为欧盟地缘战略重点地带。姬文刚教授首先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交织共存的理论解读出发,认为当经济相互依存产生的“人为空间”与特定的领土地理边界吻合时,特定领土的地缘政治争夺就变得不可避免。中东欧地区呈现出俄欧能源依赖的不对称性以及俄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态势,俄罗斯坚守中东欧地区的地缘空间并继续融入亚洲,美国借助北约军事力量实施战略威慑,并破坏俄欧能源相互依存的现状。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国家加强横向联系,构筑次区域合作,并利用次区域组织与美国加强合作,强化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杜卫华副教授首先用数据分析了中美欧能源进口来源及结构,指出欧洲能源进口极度依赖俄罗斯,多元化压力巨大。具体到德国,其能源生产和供给依赖可再生能源和煤炭发电,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比重较大。俄乌冲突爆发后,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能源供给多样化的战略成为德国能源战略调整的重心,避免单一依赖成为德国能源政策的出发点。

三 大变局下的中欧关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危机,中欧关系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与

调整。学者围绕大变局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展开讨论,研究对象不但涉及中国、美国、欧洲三边关系,还包括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国以及中东欧地区。除经济、政治关系外,欧洲智库和欧洲议会的对华政策也成为学者的焦点。

许多学者从政治领域探讨大变局对中美欧关系的影响。赵怀普教授指出,中美欧关系是国际格局中最有代表性的三边关系,其以合作和竞争为特点。此外,中美欧关系存在不对称的博弈模式,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美欧的战略一致性大于分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大于中欧、中美之间的一致性。中欧之间总体上是一种竞合关系,具有良性特征。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扮演三种角色:利益相关者、非正式盟友和矛盾的伙伴。张骥教授指出,百年变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就国际关系和中美欧关系来说,主要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再集团化”和美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日渐保守,多边主义更工具化,美国的联盟外交也改变了此前松散的状态,变得更加“刚性”。此外,美国还强化了对同盟的控制,并在外交中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维护自身利益和绝对收益,维护美国霸权和优势,保护主义倾向更加明显。美国更看重美欧关系的工具性作用,将美欧关系服务于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对华竞争的需要,而较少顾及欧洲利益。面对中美竞争,欧洲不想在中美两极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希望增强自身战略自主的能力。李杉研究员指出,进入后疫情时代,中欧政治关系呈现复杂演变态势,欧盟各成员国对华政策呈“割裂”状态,不同成员国、机构、政党以及群体对华立场差异明显。欧盟主要大国总体上对华政策保持平稳,

而部分小国利用涉华议题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严重损害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欧盟希望通过塑造欧盟与其他欧洲国家、亚洲国家以及美洲国家的关系来寻求其经济利益,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显著加强,中欧关系修复仍面临重重阻力。张壹铭博士指出,近年来中国与欧盟在意识形态和主权问题上屡现争端。这体现出双方对彼此行为的容忍度逐渐降低,中欧关系中原有的模糊空间缩小,从而导致中欧之间务实合作的减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欧盟对抗性的对华身份定位和以价值观为根本出发点的外交方式,使得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机制遭到破坏。创造一种“承认差异、允许批评”的模糊空间,有助于重塑中欧之间良好的合作机制。

从经济层面分析中欧关系的调整也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忻华研究员认为,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欧洲改变了对国际经济与战略走向的研判,美欧愈加频繁地开展磋商,并将矛头对准中国。双方在技术、产业、贸易、投资、发展援助和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密切磋商,致力于建立联合研发、生产分工、“友岸外包”等合作形式,运用“经济战”与中国对抗。孙楚仁教授指出,由于各国以及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不均,近年来,国际经贸由效率逻辑转向政治逻辑,具体表现为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化进程受到很大影响。其中,中美战略竞争成为核心主题,并严重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交往和格局。由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呈现为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态势,欧盟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结果的核心主体。加强中国与欧盟的产业链合作,是保证中美战略竞争结果偏向中国的关键要素。而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

助于加强贸易伙伴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合作,特别是有助于发展中欧在彼此具有比较优势行业上的全球价值链合作。赵柯副教授指出,欧盟对华经济外交从“以商促变”的旧框架转变为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框架。后者旨在通过重塑多元化、本地化的经贸网络,推出更具针对性的贸易投资工具以及加强“大西方”的对外经济政策协调,来应对中国的所谓“系统性竞争”。新框架具有浓厚的价值观色彩,对抗性明显加强,但它不寻求改变中国和对华经济脱钩,给中欧关系的调整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合作空间。寇蕊副教授基于对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指出,中国对欧盟的依赖度降低,而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度提高,双方非对称性关系有所缓解,同时价值链的区域性进一步增强。安全性在企业投资布局中的重要性提高,欧盟将进一步强化“经济主权”,非经济因素成为重点考量因素。尽管如此,由于多年来中欧之间形成了经贸关系韧性,经贸关系仍然会在双边关系中扮演重要作用。刁莉教授围绕中国—中东欧贸易便利化这一主题,模拟了2009—2019年间中东欧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趋势,认为双边贸易迅速发展。然而,疫情与俄乌冲突使得正常的预期出现扭曲,新的数据表明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消费能力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而对双边贸易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大国关系及欧洲重要机构组织的对华态度也成为学者的关注对象。就中德关系而言,杨解朴副研究员指出,默克尔总理的第四个任期内中德关系进入竞合与重塑的阶段。默克尔长期在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维持平衡,经贸合作成为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德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德国对华

关系的基本框架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已经形成,但本届政府可能存在内政压力外溢的风险,导致中德关系的波动。黄萌萌博士指出,近年来,德国的自我认知与盟友的期待均有所改变。从自我认知的角度来说,民意越来越支持德国开展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并支持其增加防务支出。而盟友对德国扮演更重要的领导角色更加期待,认为其继续作为“犹豫的领导者”不符合盟友的利益。当前,德国提出了自身作为“建构力量”的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权力政治、国际责任、价值观与利益、国际秩序观四个方面。德国的“建构力量”既有规范性力量的底色也有现实政治的逻辑。徐瑞珂副教授指出,相较卡梅伦时期和梅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在约翰逊时期发生了重要转变,致使两国关系陷入自2010年保守党执政以来的最低点,中英关系“黄金时代”风光不再。约翰逊政府之所以实行日益强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因为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遭受了来自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双重压力。国际压力主要源自英国所处的联盟体系,英国的主要盟友(尤其是美国)都采取了愈发强硬的对华政策;国内压力主要源自英国议会中保守党后座议员和反对党议员,议会对华强硬派不断壮大。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同时加剧了约翰逊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使得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逻辑和安全逻辑。张莉教授分析了欧洲18家主流智库的400余篇报告中所体现的中国观。她指出,欧洲智库对中欧关系建构和中国形象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欧洲议会的反华态度是欧盟机构中最强烈的,这是因为议会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受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较大。中国应加强与欧洲

议会的沟通交流,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重视欧方的核心利益,将有助于改变欧洲议会的对华态度。

四 欧洲政治与经济

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传统主流政党支持率下降、党派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加剧了国家内部意见分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受能源危机和高通胀影响,欧洲经济增速正逐渐放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交织,欧洲政治经济处于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参会学者围绕政党政治、身份认同、欧洲战略自主、欧洲金融投资、欧洲产业政策等方面对欧洲政治经济问题展开讨论。

参会学者阐述了欧洲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中国的影响。林德山教授认为,随着欧洲传统主流政党政治影响力的持续下滑以及政党结构的碎片化,欧洲的政党政治展现出新的结构状态,其基本特征是维持一种脆弱的政治平衡,即在碎片化结构上的新的左右平衡。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凸显在政党政治的竞争主题中,主要包括传统物质主义政治与后物质主义事务的交叠并存、传统阶级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跨阶级的代际分化的并存、对一体化的诉求与寻求国家保护的政治取向的并存,以及对民主制的坚持与对传统代议制的怀疑的并存。这些都将持续影响欧洲新的政治共识的形成。玄理博士认为,民粹主义者的“后真相”动员策略的内在逻辑主要通过塑造道德合法性、民主合法性以及认识论权威的合法性来实现。民粹主义者的“后真相”动员策略的生成机制包括对科学精英的道德审

判,诉诸情绪作为感召人民的手段以及构建“反知识”与阴谋论。在政治影响上,民粹主义者的“后真相”动员策略一方面造成了欧洲民主的认识论危机与政治极化,另一方面则对科学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段德敏研究员认为,身份政治起源于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身份政治的初衷是解放被压迫者,但也遭受了很多批评,如破坏社会团结,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欧美身份政治有区别,美国无论是左还是右,都试图夺取国家机器以实现理想,其后果十分严重,甚至带有内战态势。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欧洲左翼的身份政治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亲欧盟,但在经济层面反欧盟;右翼的身份政治总体上反欧盟或疑欧,认为欧盟将弱化地方性认同。欧盟不具备强大的国家机器改变人们的基本权利,因此身份政治更多地导致地方主义情绪加剧,反整合、分裂的势头增加。无论是外部战争还是移民危机,都不足以支撑欧盟的身份认同,其建构之路充满不确定性。宋黎磊教授以欧洲未来大会为切入点,以差异性一体化为分析视角,指出成员国对于大会出发点及所追求目标取得一致,而新老欧洲国家关注的主题以及同一主题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差异性一体化的存在破坏了欧盟的凝聚力,成员国如何协调利益仍然存在分歧,因此,欧洲未来大会的前景不明朗。党和莘老师指出,“规范性强权”反映了欧洲通过价值规范来追求自我利益和进行实力政治建设的战略目标,将欧洲一体化思想运用于全球治理,通过输出其价值观、原则和规范,塑造符合欧洲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不同,欧洲的规范性强权主要通过制度建设,实现自身全球治理的目标,但其规范性建构的合法性有待进一步

探讨。

欧洲战略自主和欧盟身份认同议题也引起参会学者的关注。谷名飞副教授认为,法国的战略自主更多强调国家利益,其提出的西方霸权终结论和北约“脑死亡”都是对欧洲警告。法国有悠久的外交独立自主传统,但与戴高乐时期差别很大,现在法国是以西方为基本盘的战略自主。与德国强调经济不同,法国更强调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自主,进而提升欧洲和自身影响力。然而,法国的设想在俄乌冲突后受到严重打击,其寻求的政治军事战略自主已逐渐转向经济层面,从而试图摆脱对中俄的依赖。简军波副研究员指出,欧盟是全球经济、科技等领域规则的创立者和维护者,它还以推广欧洲价值和规范为己任。因此,规范力量长期以来是欧盟身份认同的基础。然而自2016年起,欧盟日益关注经济和民生问题之外的国际事务,开始具有向“地缘政治力量”转化的自觉性。中美博弈、俄乌冲突、初代全球化的衰落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成为欧盟身份认同变化的关键动力,而欧盟地缘政治转型也将冲突与争夺引入欧洲大陆,改变了其作为“和平方案”的特质。即便如此,在地缘政治转向中,欧盟的防务自主、东扩以及重塑他者方面均面临挑战,因而难以成为纯粹的地缘政治玩家。

当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欧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受到削弱,欧洲金融问题引起学者关注。胡琨副研究员认为,欧洲货币联盟作为“非完全货币联盟”,其调节模式与积累体系并不完全匹配,因此时刻处于不对称冲击和经济失衡的风险之中。为促进各成员国宏观经济平衡发展与趋同,调节机制在欧元区逐渐成形,促进了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关联。

然而,以劳动生产率和国际收支失衡为主要表现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剧,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基于欧洲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共识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现状,欧盟更多地在技术层面着眼于引发危机的具体问题与制度漏洞,完善与经济积累体系相匹配的调节模式,以维持欧元区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共同债券与财政转移支付工具创造性地撬开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大门,使欧元区向“最优货币区”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孙雅雯博士认为,欧盟作为全球可持续转型的倡导者和先行者,致力于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基于此,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持可持续转型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出台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战略规划,设定顶层目标、协同各个实践主体加强合作,在外部压力机制中强化对可持续转型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欧盟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撬动社会资本流向可持续转型领域,为创新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同时,欧盟的绿色资本市场联盟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内部碎片化的绿色资本市场正加速整合。

相关学者还关注到欧洲对外经贸投资的问题。杨希燕副教授认为,欧洲不同国家与中国开展经贸投资合作态度存在差异,有些国家认为经贸合作可以促进自身发展,有些却认为会破坏欧洲一体化。通过实证分析,她指出,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提升欧盟内整体贸易水平,更加深入的协定条款将进一步提高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价值链联系,对于促进欧洲一体化具有积极意义。张晓通研究员认为,欧洲地缘经济研究呈现从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倾向,特别是21世纪以来,欧洲强调地缘经

经济的实用性,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地缘经济学融合,对地缘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做出新的诠释。“地缘经济欧洲”意味着欧盟基于地缘结构与经济实力,将经济行为与全球政治联系起来,利用经济手段提升对外政治影响力与权力投射能力。“地缘经济欧洲”强调经济对政治的能动作用,以欧洲团结为建设核心,力图改变地缘因素,强化自身竞争力,因此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治理模式。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到欧盟内部的产业政策、就业改革和经济趋同等问题。孙彦红研究员指出,受欧债危机及疫情影响,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两者关系也呈现新的趋势与特点,即由“主从”框架下的功能互补逐步转变为围绕欧盟整体发展战略的积极主动的密切协调。其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兼顾维护内部市场竞争秩序与提升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两大目标,而这也是欧盟推进“开放性战略自主”的关键所在。近两年带有“大项目”特征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纷纷启动,既是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密切协调的集中体现,也表明当前欧盟经济政策的理念与实践处于重要的探索与调整期,其进展及成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走向,也将影响“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变化。关信平教授和柳静虹博士认为,就业问题是欧洲近年来面临的最严峻、最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之一。国家的就业促进政策往往因未能准确反映劳动者和市场的需要而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效。要使就业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对就业促进政策与民众的就业意愿、就业行为和就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入的分析。这不但有助于重新

思考当下的就业问题,还有利于批判性分析与全面阐述就业政策的演变逻辑。马骏驰博士指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东欧国家非但没有出现西欧的经济趋同,反而有所退步。从经济史角度来看,欧债危机造成的欧洲内部的经济趋异程度远小于20世纪50年代。他以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欧盟新成员国为例,指出这些国家虽然与西欧经济深度捆绑,但由于已有产业转型成本高、单一市场中无法实现高度进口替代,加之缺乏自主支柱产业,欧盟新成员国与西欧经济趋同前景并不乐观。

五 欧洲外交与安全

作为世界的重要一极,欧洲对外关系也十分重要,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还是在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中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此外,安全问题与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欧洲安全问题影响地区和平与繁荣,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也是欧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会学者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北约防务、欧洲安全等角度展开了分析。

欧洲国家的外交问题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伍慧萍教授认为,在地缘政治变局和制度竞争态势的时代背景下,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呈现一系列重大转向:在安全政策领域,德国开始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加大对军事实力的投入;在外交政策领域,德国重新审视“新东方政策”,加大对印太等重点地区的调整和布局;在国际角色定位上,德国意欲在欧洲和全球层面承担领导作用;在对华政策领域,德国着手降低对华依赖性,日益强调对等原则,强化价值观外交以及欧洲内部协调和欧美协调。德国的政策变化对于欧洲安全格局构建、德国自身国际地

位、大国互动关系以及中德和中欧关系均会产生影响,但同时也面临若干限制因素,包括德国自身的军事短板和国内政治因素以及欧美等外部因素。曲兵副研究员将近年来的英国外交政策总结为六点:力推价值观外交、一如既往重视网络外交、安全考虑优于经济收益、虚张声势和象征性举动增多、美国因素更加凸出,以及内政对外交的牵制作用明显。在地缘竞争加剧的时代,英国抱有大国雄心,其在国际舞台上仍有抢眼表现,但“印太重要玩家”“反俄急先锋”等虚荣难掩其外交困境。在国际事务中,英国几乎无力影响美国的决策,反而处处受制于美国。陈新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大国博弈下的立陶宛外交展开分析。首先,安全上的脆弱感、国家形态变更的历史和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使立陶宛精英意识到国家地位的脆弱性。其次,美国是立陶宛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立陶宛总统和外交部长间职权的调整和互动对立陶宛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重大影响。新任总统缺乏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经验,但工作经验让其更加强调价值观和价值观外交。基于以上因素,从2021年春季开始,在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后,立陶宛在对华关系上勇当反华急先锋,导致中立关系的急剧恶化。夏立平教授以小国国际作用理论为支点,指出小国主要通过软权力来大幅提高其国际影响力,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制度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这为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一些挑战。

另有学者就欧盟对华政策做了解读。欧亚副教授指出,出于对中国实施科技自主创新战略的回应,欧盟于2006年提出了“开放创新”

理念,以延续与巩固20世纪80年代中欧开展科技合作以来欧盟对华技术出口、劳动力利用和技术转化市场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欧盟以“开放创新、开放科学、向世界开放”为纲领的科技外交战略。随着欧洲进入重新平衡与中国关系的新阶段,基于中国向科技强国转型的趋势,欧盟以“开放战略自主”的新条款取代“向世界开放”的口号,重新评估中国在中欧科技合作中的身份,寻求与中国制定科技路线图以对中欧科技合作施加更严格的条款。赖雪仪副教授对2022年欧盟发布的《战略指南针》与2003年和2016年出台的另外两份安全政策文件进行对比分析。她认为,第一,欧盟安全议题愈发重要;第二,欧盟曾长时间处于政治平衡状态,现在则呈现较强的脆弱性;第三,欧盟一方面希望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离不开美国和北约;第四,欧盟始终强调价值观外交,不同的是不再强调规范性力量。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问题、欧洲安全结构及相关问题也受到参会学者的关注。王义桅研究员认为,“欧洲的北约”和“北约的欧洲”存在矛盾,“美国治下的和平”悖论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北约作为军事联盟秉持集体安全原则,而北约扩张使成员国陷入安全困境;第二,美欧战略核心目标存在差异,导致二者间存在“被牵连”和“被抛弃”的恐惧心态;第三,由于美欧间非对称依赖,欧洲具有脆弱性,“被抛弃”的代价往往高于“被牵连”的代价。由此,欧洲尝试战略自主,然而这一尝试和美国希望在联盟内部保持主导地位的意图发生冲突。“美国治下的和平”和“欧洲自主的和平”不兼容。若要实现战略自主,欧洲须摆脱冷战思维和对军事联盟的路径依赖,摆脱对美国霸权的

幻想,并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目标。赵纪周博士认为,北约“全球化”包含三个维度:贯穿于冷战时期与冷战后的时间维度、覆盖北大西洋与印太的地理空间维度,以及陆海空天网络极地的多疆域维度。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全球化趋势加强,治理的演化更具有地缘政治竞争色彩,美国和北约不断介入北极事务且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因此,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将面临较大挑战。徐若杰博士认为,新版战略概念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北约未来十年大战略方向的确定。新一轮北约战略转型的启动,将重塑欧洲和亚洲地区安全秩序,推动大国战略竞争向着“泛安全化”和混合性方向发展。杨海峰副研究员认为,随着拜登政府上台执政,美欧关系整体回暖,双方的安全与防务关系更是明显提升。尽管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在2021年经历了阿富汗撤退、美英澳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事件的冲击,但俄乌冲突迅速成为双方安全与防务领域的优先事项,有力推动了双方协作的加强。但是,美欧在安全与防务力量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在意图上存在无法忽视的差异,这对双方未来应对俄乌持续冲突、伊核问题等国际危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邢瑞磊副教授认为,欧盟一系列的安全危机源于欧盟制度的蜕化。因此,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方向可以从制度角度进行深入考察。首先,制度由外源性的功能绩效和内生性的观念规范共同构成,因此,欧盟安全制度的功能性绩效是“权力平衡”,而规范观念则为“威胁感知”。其次,根据功能性绩效和规范内化程度,欧盟的安全制度建设和安全战略调整大致可分为“功能性调适”“制度蜕化”“制度内卷”和“同步演化”四种理想类型。目前,欧盟在本体

安全和生存安全的双重冲击下,正处于“制度蜕化”阶段。最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通过战略自主和地区(欧洲)、跨地区(印太)全球秩序塑造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欧盟安全制度“同步演化”。方炯升博士生对欧盟对美反制问题展开分析。他认为,经济反制是一国政府在面对他国经济胁迫或其他利用经济杠杆侵犯本国利益的行为时,实施自我保护或回击的对冲性经济外交手段。根据反制对象是结构性权力还是关系性权力,以及反制目标是抵制还是保护,可以将经济反制划分为拒止、规避、惩罚与替代四个类别,四类反制措施之间存在效能差异。反制措施应对的胁迫权力可逃逸性越强或自身成本可控性越强,其效能越高。欧盟是现阶段实施经济反制的代表性行为体。

六 闭幕式及大会发言

在大会闭幕式的主旨发言环节,各参会学者分别从欧洲安全政策转型、欧盟对外战略调整、俄乌冲突、欧洲政治生态和欧俄博弈等角度展开演讲。郑春荣教授提出,俄乌冲突使欧洲国家意识到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安全支柱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欧洲对美国/北约的依赖性,使得欧洲难以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和防务独立。欧洲安全政策的转型会促使欧洲更多地倚重硬实力,而非对软实力的强调,这也会反映在其盟友和伙伴对欧洲的期待上;转型还会促使欧盟及相关大国更希望介入印太地区,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响应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门镜教授回顾了欧盟自建立以来发布的对华政策文件、对亚洲的政策文件和外交与安全战略文件,对比三类文件中欧盟对华态度的转变,指出其越来越明显地把

中国推向对立面。然而,欧盟无法回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力和对世界的贡献,也不可能离开中国巨大的市场。欧盟的价值观外交和经贸利益使其对华关系的定位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化解欧盟的敌意,强调和而不同和务实合作,使中欧关系最大化地符合双方利益。丁一凡研究员认为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前景暗淡。一方面,欧洲之所以在全球化中还能维持一定的工业优势,俄罗斯所提供的廉价能源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因为一系列制裁措施,欧洲的通胀和财政危机加重,再工业化受挫。欧洲对美国依赖因为冲突而加深,但欧盟内部依然存在意见分歧。而北溪管道的爆炸可能揭示出美国想借机控制欧洲的企图,美国控制欧洲的手段与前景将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刘作奎研究员认为,欧洲政治生态长期存在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争。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政治生态经历新一轮的调整和重塑,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分歧在俄乌冲突下被搁置,而出现“中东欧化”的政治现象。“中东欧化”集中体现在加速“去俄化”,尤其是在经济、金融、能源、安全与防务、人文等领域同俄罗斯部分或全面脱钩,在跨大西洋安全上拥立美国和北约,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更强调安全利益而弱化民生政策。“中东欧化”是否会长久持续

尚有待观察,但它将日渐成为欧洲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凸显了特殊背景下小国在联盟政治或一体化组织中所能发挥的引领性作用。冯绍雷教授认为,俄乌冲突带来了以下影响:全球转型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国际经济互利可能会被打破,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基础面临直接挑战,中俄伙伴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周期性均衡关系可能会被打破,国际力量的组合和对比状况得到改变。

在闭幕发言中,佟家栋教授指出,世界与中国都处在变化之中,如何调整中欧关系尤为重要。欧洲的战略自主研究意味着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如何看待欧洲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的立场观点,以及如何发展中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战略自主在世界格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陈新研究员在年会总结中表示,欧洲转型、大变局下中欧关系的发展等研讨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中欧关系不应是对抗的或系统性的竞争对手,不同制度之间仍然可以互相包容和合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依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未来双方关系的拓展值得期许。

(责任编辑:宋晓敏)